

困在教室的青春与刺破规训的声音：从韩寒21岁的通透中看懂一代人的教育幻灭与觉醒

JokingKong · 2026-07-21 21:28

在漫长的青春期里，每个人大概都曾盯着前座同学的后脑勺发过呆。在那间塞满了五十套桌椅、空气中弥漫着粉笔灰与汗味的教室里，时间仿佛是被装进真空袋的肉制品，沉闷、干涩、枯燥、凝固、机械、乏味。窗外的蝉鸣和树影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而我们手里攥着的，是永无止境的试卷。那种被固定在窄小木椅上的触感，以及由于长时间握笔而在中指留下的厚茧，构成了某种隐秘的集体记忆。我们被告知，这套流程是通往成人的唯一洗礼。然而，当那个退了学的年轻人，在二十一岁的当口，把这些被视为金科玉律的规训拆解开来，扔进一本名为《通稿二零零三》的集子里时，我们才恍然发现，原来那些年我们服下的“苦药”，未必都是为了治病。

这是一本谈论教育的书，但它更像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坐在废墟边上给战壕里的战友们写的避雷指南。二零零三年的韩寒，正处于一个奇妙的节点：少年成名的喧嚣尚未散去，而退学后的自由生活又给了他足够的落差来回望那个庞大的教育机器。他没有用那种老气横秋的社会学口吻来谈论体制，也没有摆出一副专家的嘴脸去构建什么宏大叙事。他只是站在那里，用一种近乎天真的直觉，指出了皇帝其实没穿衣服。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这是书中开篇没多久就砸下来的一句话。它像一颗掷入死水的石头，激起的是一种常识性的震荡。学校在这个语境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隔离区。它把知识从生活中剥离出来，晒干、压扁、切片，然后强行塞进我们的脑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失踪了——那是对世界最原始的好奇心，以及那种与生俱来的、鲜活的探索欲。这种剥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许多人在离开校园后，便终生丧失了学习的能力。

最让人感到荒诞的，莫过于语文教育。我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去研读母语，结果却是在学习如何更加熟练地撒谎。在韩寒看来，这门课程在初中之后几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语文原本应该是关于感知、关于审美、关于自我表达的，但我们的课堂却把它变成了一场关于猜谜和投机的游戏。他在书中直言不讳：「作文是一种模式，就好像要撒一个官方的谎，必须有时间人物地点，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向上的主题。比如我记载完一件事情后，我没有权利为这件事情感到迷茫，没有权利为此觉得生活真是没有意义。总之就是不能说真话，完全扯淡就是了。」

这种对真实的压抑，是从每一个标点符号开始的。学生们被要求在作文里寻找并不存在的感悟，在结尾处升华并不真诚的灵魂。这种教育最恶毒的地方在于，它在潜意识里告诉每一个孩子：你的真实想法是不值钱的，甚至是危险的。你必须学会迎合，学会揣摩那个藏在评分标准背后的意志。

书里提到了那种对文学作品的“碎尸万段”式的解读，那是每一个经历过中国中学语文的人都深

恶痛绝的。出题人像是一个手持放大镜的怪癖侦探，非要在作者的一个喷嚏里找寻时代风云的变幻。韩寒曾以自己文章被选入试卷为例，发现身为作者的自己竟然拿不到高分，这简直是神来之笔的讽刺。「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语文喜欢把别人的文章一字一句加以拆解，并强行加上后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出题者的看法，当学生提出不一样的观点时，会有人说：错，作者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而且选择的文章有八成作者都是上个世纪就死了，真是死无对证了。」这种对文本的霸权式解读，本质上是对思想的围剿。它不允许异见，不承认多元，它只要那个唯一的、干瘪的、被审定过的“标准答案”。

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变成了一种极度消耗体力和心力的表演。韩寒在书中自嘲，写作文的感觉如同按摩小姐，一边辛苦，一边还要不断察言观色考虑客人的舒适度。这种比喻充满了幽默与辛辣，它揭示了一个悲哀的事实：在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里，受众的满意度——或者说权力的满意度——永远高于个体的真实体验。「可以说，很多人的撒谎体验都是从作文开始的，而为数不多的说真话体验，是从写情书开始的。」这句话读来让人哑然失笑，笑过之后却是彻骨的荒凉。当真诚只能在被禁止的早恋里苟延残喘，而课堂却成了伪善的温床，我们还能指望这台机器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不仅是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被这股功利主义的风气席卷。关于数学，那个著名的“逻辑思维”论调被他轻易地戳穿。对他而言，普通人学数学学到初一已经足够应付余生，往后那些晦涩的公式、复杂的曲线，大多只是为了在考试中作为筛选人的栅栏。这种筛选本身就是一种傲慢，它默认了只有具备某种特定计算能力的人才值得进入上层社会。至于英语，那更是一场耗时费力却收效甚微的全民运动。「学十年英语，出来还是不能讲好英语，这不光是我们学习不好，也不能完全怪教材如何，这就像我们在没有赛车场的时候记住了一堆赛车理论，在没有转过弯的情况下知道应该怎么去转弯。」这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的教育，除了制造一批只会背单词的机器，到底给我们的国民素质带来了什么质的提升？

在这本杂文集里，教师的形象也从神坛上跌落。我们习惯了用“春蚕”、“蜡烛”这样充满自我牺牲色彩的词汇去包装这个职业，但韩寒却用一种冷峻而直白的笔触，剥开了这层道德糖衣。「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糊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他指出的，是一个关于职业常识的问题。当一个行业被过度神话，它的从业者就容易产生一种近乎神权者的幻觉，认为自己有权对学生的人格进行全方位的修剪。那些因为成绩差而遭遇的歧视、那些动辄“叫家长”的威吓、那些在食堂里并无阳光照耀的平庸日子，才是教育现场最真实的一面。

还有那个被喊了多年的“全面发展”。在我们的校园里，这个词被扭曲成了“全科应试能力”的代名词。你不能有短板，不能有偏好，不能在非考试科目上浪费时间。如果你在文学或体育上有惊人的天赋，但却解不出那道关于阴影部分面积的数学题，你依然是一个“差生”。这种评价体系就像是一个模具，它不看你的材质是金是玉，它只看你能不能严丝合缝地钻进那个名为“优生”的小孔里。「你不能管一个人考试考得好叫全面发展啊。」韩寒这种直觉式的反问，直指那套逻辑的荒谬。那些所谓的优生，在走出校门后，往往除了考试一无所长。他们知道二氧化碳

在多少度会变成干冰，却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复杂的人世间像个完整的人一样活着。

书里对学校管理的描述，充满了干练与直接。学校不是象牙塔，它更像是一个充满了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和经济利益纠葛的小型社会。从乱收费到强制订购豆奶，从严厉打击早恋到流于形式的军训，每一处细节都在展示着一种名为“管理”的暴力。军训的烈日并不能增加爱国心，强制性的吃苦也未必能让人耐劳，它更多时候只是为了展示一种整齐划一的服从美感。「爱国之心在看中国队踢世界杯或者中国使馆被炸时都在体现和培养，实在不会因为一个班级在烈日之下暴晒了几十小时而增加。」这种对形式主义的拆解，让人感到一阵清凉的痛快。

尤其深刻的是他对于招生公平和阶层差异的洞察。在那个很多人还对教育公平抱有幻想的年代，他已经看出了金钱和权力在考卷背后的影子。「所谓压力大、学习苦、名额少，全是老百姓的事情，有钱有权的人，从没有说过教育有什么不好，因为这完全是他们所不能体会的东西。」这种阶层维度的介入，让这本书超越了简单的学生吐槽，而具备了某种现实的沉重感。

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上升通道都挤在高考这窄窄的一条路上时，压力便不再是精神层面的词汇，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焦虑。大学生们的“高分低能”，以及步入社会后的眼高手低，在韩寒看来，不过是这套闭门造车的教育体系必然产生的废品。他们被教导了二十年如何解题，却在面对真实的职业挑战和人际沟通时，显得局促而笨拙。

在书的结尾，韩寒展现了一种属于年轻人的真诚。他承认自己当年的批判带有情绪，甚至在后来的修订版中为自己对现代诗的偏激言论道了歉。这种成长是可见的，但那种反抗的骨架依然硬朗。他不想做一个职业的教育批评家，他只是想记录下那种在一个僵化体制内挣扎过的、真实的痛感。

现在回过头来看，《通稿二零零三》确实是一部带有强烈时代印记的作品。它产生于一个旧体制与新思潮激烈碰撞的缝隙里。以一个成熟杂文家的标准来衡量，这本集子里的文字确实显得有些毛糙，它的批判力度、思想纵深与文字质感，其实都有待商榷。这种局限性是可以预见的，毕竟那是一个二十一岁青年的率性之作，他的阅历尚未厚重到能进行深层制度溯源的程度，他的思辨也多半停留在现象级的捕捉与情绪化的宣泄。

韩寒的优势在于他那种野生的力量感，敢说、直白、不绕弯子。他不需要引用大段的拉丁文，也不需要搬出康德或卢梭来撑场面。他只需站在那个被无数学生坐过的冷板凳上，大声说一句“这不对”，就能让整间屋子的人心里咯噔一下。那种戳破形式主义、官僚化和单一评价标准的痛快，给当时的读者提供了极高的心理补偿和共鸣空间。但也正因为这种锋芒多源自天性而非理性，使得全书的逻辑链条在某些时候显得有些松散。

他准确地指出了“哪里不对”，却很少有余力去深入探讨“为何不对”，更遑论给出“如何才对”的建设性方案。这种批判是横冲直撞的，充满了少年人的锐气，却也因此少了一份穿透表象后的沉稳与厚度。读他的文字，能让人出一身大汗，能让人解气，却很难带来那种绵长、深邃、足以引发灵魂震颤的思想余韵。

如果把这本书放在杂文的长河里去比对，它的坐标就更加清晰了。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质感的差异。有一些作家的批判，是冷静的、克制的、如同在深水区潜行的巨舰。他们善于用理性的

隐喻和绵密的思辨力量击穿时代的厚墙，每一处转折都透着一种阅历过后的淡然与坚定。相比之下，韩寒的文字更像是一束束刺向黑暗的手电筒光，亮则亮矣，却往往照不到最底层的根基。他的文字更接近一种公共表达的“爽文”，它负责呐喊，负责说出大家心里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这种功能在那个时代极其重要，但它确实还未抵达那种炉火纯青的思想高度。

然而，我们实难苛求一个在二十一岁便早早弃绝行囊、离群索居的少年，去供奉出某种陈年、厚重、缜密、苍老的思想祭品。要求一个尚未被岁月磋磨的年轻人具备晚年鲁迅式的深壑，这本身就是一种智力上的傲慢与刻薄。可叹的是，当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二十一岁那年，尚且耽于那种稚嫩、浑浊、混沌、蒙昧的平庸认知，甚至还在为某种虚妄的集体荣誉感而自鸣得意时，韩寒已然拥有了一双清亮、明彻、觉醒、超拔的眼睛。反观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多数人，二十一岁时的念头大约只能用“混沌未开”乃至更粗鄙的词汇来形容。他那种在那个年纪便已卓尔不群、傲立群雄的高认知，那种对体制逻辑近乎本能的直觉与拆解，在那个万马齐喑的语境下，确实是一种极罕见的通透与清醒，难得至极。

而且，从文本气质上讲，《通稿二零零三》必须是一部值得尊敬且具有高度时代价值的作品。它像一份关于世纪之初青年生存状态的社会学采样，真实地记录了那一辈人对教育的幻灭感与反抗。书中那种批判力度的收敛，或许并不全然是作者能力的问题，更多时候是受制于当时的表达尺度和出版环境。在那样的语境下，能把这些话说明白，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

总而言之，这本书胜在它的“真”。在那个充满了套路和伪善的教育环境里，一个真实的、会痛、会嘲笑、会愤怒的声音是如此珍贵。它未必能成为一本伟大的思想经典，但它绝对是一本诚恳的时代读本。它以一种退学青年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应试教育的窗口。即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这些文字，发现其中的许多痛点依然能精准地扎在当下的现实里，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也是这本书持续生命力的来源。

我们在学校里待了太久，以至于忘了世界其实很大。在那场漫长的、关于分数的马拉松里，我们曾以为终点就是一切。而《通稿二零零三》像是一个中途跳出跑道的疯子，他站在路边的草地上，对着还在闷头苦跑的我们喊了一嗓子：“嘿，别跑了，那边风景挺好，而且，这根本不是唯一的路。”这种声音，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们停下来，哪怕只听那么一小会儿。毕竟，教育的初衷应该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真实、拥有创造力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在驾校里开了二十年车却从未上过路的“专家”。



扫码进原文:

<https://ximutan.com/forum/post/18>

以书会友，谈论天下

© 西木读书论坛